

從書籍出版看戰後日本 亞洲意識的變遷

• 馬場公彥

一 再次「西風壓倒東風」

日本出版界仍然牢牢囿於偏重西方與古典的優劣結構。第一，「西高東低」，即將西方文化配在高檔和將東方文化配在低檔的結構。在出版局面呈現出西邊出超東邊入超之狀況。第二，「古高今低」，即愈追溯到上古價值愈高級，而愈下到當代價值愈低級，囿於隨着時代流逝美好古典文化漸漸消失的觀念。

80年代以後，亞洲對日本人成為貼身存在，而滲透進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與在日本商品市場上充滿中國製造的商標相比，在亞洲商品市場上也充滿日本公司的牌子。以1988年舉行的漢城奧運會為契機，在東亞等區域流通着相同的運動、電影、流行歌曲等，各國人民相互跨國往來也成了不稀奇的光景。

雖然如此，日本出版界仍然牢牢囿於偏重西方與古典的優劣結構。

第一，「西高東低」，即將西方文化配在高檔和將東方文化配在低檔的結構。文化、思想風壓倒性地從西邊刮到東邊，因此在出版局面呈現出西邊出超東邊入超之狀況。第二，「古高今低」，即愈追溯到上古價值愈高級，而愈下到當代價值愈低級，囿於

隨着時代流逝美好古典文化漸漸消失的觀念。

在日本慣用詞彙中，傳統文化方面一般使用「東洋」一詞，近代以後一般使用「亞洲」一詞。尤其稱作「東洋思想」時，是由印度的吠陀哲學、佛教教義、伊斯蘭神秘主義或中國道家思想等屬於神秘思想的譜系，和由《論語》、《孟子》、《傳習錄》等儒家系統處世倫教格言，《史記》、《漢書》等正史裏登載的人物事迹，以《三國演義》、《水滸傳》為首的想像豐富的文學，或以《唐詩選》為代表的膾炙人口的古詩等屬於中華古典文化的譜系而融合在一起的。而後者的譜系大致相當於日本高等學校「漢文」學科。

此「漢文」教養世界就是日本化的傳統中國想像，成為日本人心目中對中國認識的框架。在出版方面描寫近代以後中國想像時常常仍然沿用此類

* 此文初稿曾在2005年2月27日在廈門大學召開的「知識網絡研討會」上報告。另，在作者用中文寫作此稿的過程中曾得到廖赤陽先生的幫助。在此謹向會議主辦者和廖赤陽先生致以誠摯的感謝。

模式。比如先連載於《產經新聞》後作為書籍出版而成為暢銷書的《毛澤東秘錄》^①，該書護封帶上寫的「激烈權力劇」、「此書是現代版《三國志》」等宣傳，由此不難推測作者要把現代中國政治盡量加工為驅使權謀的權力鬥爭戲劇，也就是沿襲中國文學的傳統手法即正史的演義化。並且此書實際上亦獲得了以日本創作作品為授獎對象的菊池寬獎。

在二戰後日本的出版界，由其他亞洲語言譯成日文的書籍中，最暢銷的可能是《毛澤東選集》吧。毛澤東是名副其實的建立新中國的領袖，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救星」。可是，現在在日本卻不能以輕便的袖珍翻譯版讀他的著作。對現在的日本人來說，毛澤東的著述已經失去了作為思想資源的意義，縱使閱讀，也僅僅是作為了解在現代中國最高領袖的領導下所做事業的參考書而已。這樣，在日本，毛澤東的著作便從「經典」變成了「史書」。

60年代，日本論壇裏領導中國理解與評論的竹內好，曾經提出了對待亞洲的新穎視角，提倡根據東方力量包容西方來顛倒從前的文化價值觀念，從而創造新的普遍性，也就是「作為方法的亞洲」（1961年）。偏巧，這正是毛澤東向西方世界發出了「東風壓倒西風」後剛剛過了四年的時候。可是當時從亞洲出發醞釀主體的強大氣氛，現在卻消失了。現在人們在說哲學、思想時，已經直接意味着西方哲學、西方思想的譜系，這已成為不言而喻之事。與竹內好曾經期待的相反，讀書界沒有了由東方自身出發面對西方的氣氛。

如果說戰後日本有關亞洲的最暢銷書是《毛澤東選集》，那麼當代的暢

銷書則是《中國可以說不》^②。據說單行本和袖珍版賣了將近十萬冊。關於該書，現在看來除了充滿了由民間年輕爭論者坦率傾吐的反美、反日主張以外，沒有值得特別介紹的內容。當時圍繞中國的氛圍是由於飛越台灣海峽的導彈演習，引起美國軍事出動，而美國軍事行動又引起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反美的時刻，並且中國經濟發展和日本經濟蕭條的對照也使中國人面對日本時有了更強的信心。與此相對，日本的所謂「有識之士」則遠離事實地將此書看作中國政府充滿惡意的反日宣傳，警告讀者說不要被缺乏言論自由的國家的輿論操作所欺騙。一想起當時反美、反日、反中感情交錯糾纏的讀書界氛圍時，就不勝痛感彼此對亞洲近鄰不僅不再抱有親切感，相反卻是心理和認識上的疏遠感。

二 被作為殖民地的亞洲

雖然在亞洲積澱着被日本侵略和殖民統治的記憶和當地人們心裏刻印着侵略恐怖和亡國屈辱的濃厚陰影，但是日本卻仍然不能面對這一現狀。圍繞日本二戰後思想空間的有關亞洲的出版物，是從重新面對在亞洲戰場所開展的戰爭體驗的意義出發的。但是，其時只面對日本人的戰爭苦難體驗，而沒有想到各國人民的戰爭苦難體驗意義。因此，所謂的犧牲者，也基本不包括廣大亞洲受難者，而是只指向日本平民或戰死沙場或彷徨於生死線上的日本士兵^③。

此後站在被加害者體驗立場的作品逐漸引起注目^④，尤其由《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報告的採訪記錄《中國之旅》^⑤，作為嚴厲譴責日軍在中國

在二戰後日本的出版界，由其他亞洲語言譯成日文的書籍中，最暢銷的可能是《毛澤東選集》。但對現在的日本人來說，毛的著述已經失去了作為思想資源的意義。在當代日本有關亞洲的最暢銷書是《中國可以說不》。日本的所謂「有識之士」將此書看作中國政府充滿惡意的反日宣傳，警告讀者說不要被缺乏言論自由的國家的輿論操作所欺騙。

侵略的紀實文學，從日本人的戰爭受害意識轉換成了對亞洲民眾的加害意識。

加之，有關日本殖民主義，雖然圍繞對國內阿伊努族或在日韓國人、朝鮮人歧視等後殖民主義狀況所引起的各種問題進行了很多討論，卻未能充分明瞭日本的殖民主義和日本的脫殖民地化方式所帶給日本的亞洲認識的歪曲影響。

亞洲認識的轉機，是在進入90年代後才開始的。海灣戰爭的爆發引起了該不該派遣自衛隊，不派兵的話應該怎麼作出國際貢獻的激烈爭論。海部俊樹首相為了消除各國對日本軍事大國化的擔憂，歷訪東南亞，明確表示對侵略戰爭的反省。時值「九一八」事變爆發六十周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五十周年之際，在「亞洲抬頭」、「日本孤立」的鮮明構圖中，要填埋日本和亞洲之間歷史認識隔閡，致力於近鄰各國歷史和解的氣氛高漲起來了。

在此契機下，我負責編輯了「岩波講座 近代日本和殖民地」這套叢書^⑥，使亞洲的抬頭和在日本醞釀的亞洲意識，一方面顯在化了日本在亞洲留下的侵略和殖民統治的遺產，另一方面浮現了在日本人中潛伏的對亞洲的贖罪意識。

同時浮現出的，還有就如何思考現代化這一亞洲各國與日本同樣存在的課題，從而圍繞着各種現代化論和歷史觀，重新提出亞洲現代化問題。其中具代表性的成果是跟「近代日本和殖民地」同時期開始出版的「在亞洲思考」叢書^⑦。此套叢書重審傳統和近代的二分法框架而提出了內發性、內在性的現代化論。作為內發性現代化論，歷史記述的重點從過去以政治當權者或知識精英為中心移行到以民眾

運動為中心的民眾史研究的同時，拒絕西勢東漸的衝擊和亞洲回應的老套近代化論，從而提出了跨越一國史觀以幾個國家和地區(包含廣域地區圈)為單位的多元複線現代化思考模式。

三 獨立和發展的亞洲

在戰後日本，「亞洲」這個詞彙一方面很強地喚起悠久歷史和長久不變的文化傳統想像，另一方面亞洲又是充滿朝氣和活力的地區。不過亞洲雖擁有古老歷史，但形成民族認同和建設成國民國家則主要在二戰前後，尤其亞非各國接二連三獨立之後。1954年由周恩來和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兩位總理提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翌年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毛澤東所主張的中間地帶論和第三世界論等新的國際秩序構想，使得亞洲在國際上的發言地位提高了，而因論述亞洲各種問題而聲譽鵲起的日本年輕知識份子其時亦紛紛湧現^⑧。他們的各種發言富有力量，促進人們轉換東西對立的冷戰世界觀或歐洲中心的結構感，因此在日本讀書界引起了對達成國家獨立偉業的領導人們，尤其是建立新中國的領導人事迹的關注^⑨。可以說60年代前後到70年代時期，是亞洲民族主義輝煌耀眼的時代。

這種亞洲想像連接1965年爆發的越南戰爭所引起的反美反戰運動高潮，吸引着對1969年去世的胡志明主席的注目，而出版了幾種有關他的評傳或言行錄，這些事情表現了對越南民族解放戰線的支持和對越南人民抗美反帝戰爭的讚意。而其時展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也給日本讀書界帶來了廣泛迴響^⑩，斯特朗(Anna Louise

1954年由周恩來和尼赫魯兩位總理提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翌年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毛澤東所主張的中間地帶論和第三世界論等新的國際秩序構想，使得亞洲在國際上的發言地位提高了，其時因論述亞洲各種問題而聲譽鵲起的日本年輕知識份子亦紛紛湧現。可以說60年代前後到70年代時期，是亞洲民族主義輝煌耀眼的時代。

Strong)、斯諾 (Edgar Snow) 和史沫特萊 (Agnes Smedley) 等西方記者在當時與日本沒有邦交的中國大陸採訪所寫各種報導也很受歡迎^①。這些書均投影出了實現民族解放的清新亞洲形象。

但是，在嚴酷的現實面前，這種表象不久就變成了幻滅感。越南戰爭結束後，越南接踵侵入鄰國柬埔寨，並與中國進行了中越戰爭。亞洲社會主義友好國家之間互相交鋒的不可思議事態，使得曾經反對越南戰爭的日本左派知識份子陷入困惑。加之，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等對革命和建國有貢獻的領導人相繼逝世，加上文化大革命宣告終結以後，逐漸暴露出來的充滿壓制肅清和權力鬥爭的「十年浩劫」真相，都使先前日本讀者所看到的清新亞洲形象受到嚴重打擊。

其後鄧小平為了挽回失掉的十年而提出改革開放政策邁向近代化，取得了令人讚嘆的堅實成果。但是，通過許可採訪的外國記者，例如《朝日新聞》的船橋洋一或《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的包德甫 (Fox Butterfield) 等報告的中國社會的實情，則與打破階級社會、推陳出新等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相反，既非民主又沒效率，好像類似近代以前社會的狀態，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新中國的失望感^②。

冷戰結束後的當代亞洲，到底面臨着怎樣的新課題呢？從此種問題出發，我負責編輯了亞洲各國政治領導人的評傳叢書「現代亞洲的肖像」^③。獨立後的亞洲的現實是，在獨立後第一代離開了權力主角角色和冷戰結束後被暴露的各種事實表明，與先前清新印象相當不同，反而許多地方充滿着被掩蓋的內亂、蹂躪人權、肅清虐殺等等苦難。

通過出版此叢書同時搞清楚的事情是，當年亞洲各國許多領導人都經歷了日本所帶來的侵略或殖民，刻印着被日本強迫的深刻經驗。然而，一般日本人不能體會到此種實際情況。這是因為日本戰敗後無條件投降而被解除了殖民地，因此日本人沒有經歷過亞洲各地在進行去殖民化實現獨立的過程中，舊殖民地居民對前宗主國的強烈反抗。與此相反，日本因為戰敗後通過美國的七年佔領體驗，達成經濟復興而成為經濟大國。美國佔領結束後締結《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在美國的軍事庇護之下用不着直接向周邊亞洲各國進行軍事和政治上的干預，所以作為冷戰受益者的日本的戰後日子還過得去，因此日本人更沒有機會共有亞洲各地居民作為冷戰受害者所蒙受的痛苦經驗。

四 全球化中向外開放的亞洲

80年代以後，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地區形成了東亞經濟圈；在中國，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政策也取得了堅實的成果。在亞洲各地隨着城市化所擴大的城市消費文化圈，以富裕的中間層為中心高漲着利己的欲望和要求政治民主化的聲音，同時動搖着對革命、獨立有功勞的第一世代領導人的絕對忠誠，萌發起與其追求「大敘述」的公共理想，不如安居於身邊實惠的「小敘述」的自私樂業的新式價值觀念。

此時期的出版界逐漸增加了從政治經濟學觀點分析亞洲經濟圈的互相依存關係的各種書籍^④，或者介紹以漢城奧運會為新時期，在亞洲開始廣泛流通的各種流行文化的書籍。反映

冷戰結束後的當代亞洲，到底面臨着怎樣的新課題呢？獨立後的亞洲的現實是，在獨立後第一代離開了權力主角角色和冷戰結束後被暴露的各種事實表明，與先前清新印象相當不同，反而許多地方充滿着被掩蓋的內亂、蹂躪人權、肅清虐殺等等苦難。

日本一直是在美國對華看法的基礎上來調整自己與中國關係的立場。就此言，日中關係實際上只不過是日美關係的從屬變數。今後中國會愈來愈積極地提出「東亞」的框架向各國呼籲組成東亞共同體的具體方策。而日本必須抉擇：要不繼續遵從在美國的絕對霸權下形成的地區秩序，要不與其他國家一起摸索形成亞洲共同體，並成為其有機的一員。

亞洲經濟抬頭，從亞洲出發的大眾文化回歸亞洲環流的狀況，突破了先前亞洲的關聯構造方式。

不過，與此相對，先前侵略和殖民的歷史卻讓日本知識份子不由抑制自己談論亞洲的欲望，因為過去日本作為亞洲盟主鼓吹「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的歷史，促使他們自然而然地加強不要重蹈覆轍的自我設限的心理^⑮。

儘管如此，現實卻要求談論亞洲。現下亞洲正躍動着要實現言論自由、政治參與自由和國民平等的民主化。民主化的摸索一方面在亞洲扎下啟蒙以來普遍價值的根，另一方面也幫助漸漸醞釀新的亞洲意識，從而必須回應甚或是「亞洲人」的認同疑問。我自己便抱有此種問題意識，負責了「亞洲新世紀叢書」的編輯出版^⑯。

展望以後亞洲的造像時必須提出的問題有兩項：第一，必須對亞洲這個地區特有的去殖民化和冷戰軌跡加以研討。偏巧1995年組成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1997年的「編寫新歷史教科書會」等右派論壇、媒體，企圖煽動日本內部民族主義，引發了中、韓等東亞各國官民的批判，並加強了日本有良知的學者或知識份子的危機感。以這些事件為起因，使日本和亞洲知識份子圍繞歷史認識的危機意識集結，並在編輯「亞洲新世紀叢書」時得到了他們的大力協助。第二，擺脫西方或亞洲、還是亞洲或日本的二元對立式亞洲認識構圖，追求從亞洲向世界發出訊息的非對抗性和開放性的地區主義的造像。從此角度看，可以說此叢書的幕後主角是在二戰後介入亞洲地區秩序極深、行使了最大最強力量的美國。朝鮮半島問題也罷，台灣問題也罷，「九一一」事件

以後鎮壓恐怖活動的共同行動也罷，有關在此地區存在的種種跨國問題，經常是美國在行使主導權。因此，沒有亞洲互相合作支持，便不能真正克服此種局面，從而開拓新的道路。

譬如在日本發行的所謂「中國威脅論」書籍、雜誌，其根源在美國；而且在日本流行的有關「中國威脅論」的書，實際上也是美國人寫的^⑰。其原因在於日本一直是在美國對華看法的基礎上來調整自己與中國關係的立場。就此言，日中關係實際上只不過是日美關係的從屬變數；恐怕與此相同的是，從中國來看中日關係也只不過是中美關係的從屬變數。這樣，日美中三角形便變成了以日美同盟關係為基調的被扭曲了的不等邊三角關係。

現在可以預料的是，今後和日本用「東亞細亞」框架來摸索地區秩序一樣，中國會愈來愈積極地提出「東亞」的框架向各國呼籲組成東亞共同體的具體方策。而日本必須抉擇其一：要不繼續遵從在美國的絕對霸權下形成的地區秩序，要不與其他國家一起摸索形成亞洲共同體，並成為其有機的一員。

五 「東亞書籍之路」的復興之夢

東亞地區的亞洲人曾經共同使用漢字，以漢字為交流工具，通過用漢字所寫的書籍，流通共同知識和文化並建立共同的價值，這在長達一千五百年的時間裏哺育了人文精神和互相敬愛的傳統。如果將以漢字為文化工具的網絡稱作「漢字文化圈」，那麼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開始侵略東亞以後，知識和文化的重心愈來愈轉移

到「西學」，從而使「漢字文化圈」的紐帶逐漸斷裂。

在最早的時期，西方的各種技藝、科學被譯成中文後再從中文譯成日文；接着，更多是西方的各種技藝、科學被譯成日文後再從日文譯成中文。尤其在日本被認為消化西方成功邁入了現代之後，同屬漢字文化圈的中國、朝鮮、越南等有許多留學生陸續來到日本，希望通過「東學」更簡便速效地學習「西學」，以推動本國現代化的事業。於是，以前的漢字文化圈建設出了實際以西方為中心結構的「知識迴廊」。

京都大學教授山室信一研究了日本殖民統治帶給亞洲的歷史遺產後，在發現、貫徹亞洲地區的亞洲意識的前題下，寫了《作為思想課題的亞洲》^①，此書第二部「在亞洲的思想連鎖」中，詳細證實了以日本作為結節環打開了連接「西學」和「東學」而貫穿歐亞大陸的「知識迴廊」的歷史過程。

二戰後，日本已喪失掉「漢學」（古典中國學）傳統，掌握日本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僅限於大學裏的中國學或國文學（古典日本文學）的專業研究學者。朝鮮、越南連漢字也廢棄，轉而使用各自的表音文字。除了文字的分隔外，也基本少有把同時代亞洲作為思想資源的知識、思想意識。

時值出版銷售不景氣和出版文化不興旺的2003年，津野海太郎等編輯人，與中國大陸、台灣和韓國的出版人共同呼籲承繼斷絕的漢字文化傳統，提出開闢類似於以前的絲綢之路的「東亞書籍之路」的號召，現在正合作用日文、中文、朝鮮文和英語出版有關書籍^②。為了實現以津野為首的出版人的「東亞書籍之路」的復興之夢，必須在東亞地區建設出告別彼此

互不信任、互不重視局面的健全公論，而編輯人正擔負着構築向全東亞開放的健全論壇的重要任務。

為此，今後到底應該期盼甚麼樣的關於亞洲的出版活動呢？

第一，關於亞洲電影、流行歌曲、烹飪等大眾文化、生活文化的書籍。亞洲共同流通的基層文化是形成亞洲共同的認同感或價值觀的必要土壤。

第二，以日本為主體，推動對近代日本在亞洲所作所為的事實的總結，以爭取實現亞洲的歷史和解。特別是，今後應該着重批判地檢討日本在其帝國統治過程中所構築的學問制度或學說。

第三，探討人口、環保、能源、富貧差距、人權保障、狹隘國族主義等等亞洲在全球化當中面臨的各種各樣課題，研究東亞地區特有的解決方法，並提出具體設想建議。

這些根植於東亞內在現實課題的探討不僅有迫切的現實意義，而且可能改變以歐美為中心的認識結構之現狀，從而為以亞洲為主體、從亞洲出發的學術思想真正奠基。

2003年，津野海太郎等編輯人，與中國大陸、台灣和韓國的出版人共同呼籲承繼斷絕的漢字文化傳統，提出開闢彷彿以前的絲綢之路似的「東亞書籍之路」的號召，現在正進行用日文、中文、朝鮮文和英語的有關書籍的出版合作。為了實現這個夢想，必須在東亞地區建設出告別彼此互不信任、互不重視局面的健全公論，而編輯人正擔負着構築向全東亞開放的健全論壇的重要任務。

註釋

① 產經新聞採訪班：《毛澤東秘錄（上下篇）》（東京：產經新聞社，1999）。

② 宋強等著，莫邦富等譯：《ノ一と言える中國》（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96）。

③ 竹山道雄：《ビルマの豎琴》（1947）；大岡昇平：《俘虜記》（1948）等。

④ 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三光》（東京：光文社，1954）；五味川純平：《人間の條件》（東京：三一書房，1956）；千田夏光：《從軍慰安婦》（東京：雙葉社，1973）等。

- ⑤ 本多勝一：《中國の旅》(東京：朝日新聞社，1972)。
- ⑥ 大江志乃夫、淺田喬二、三谷太一郎、後藤乾一、小林英夫、高崎宗司、若林正文、川村湊編輯：「岩波講座 近代日本と殖民地」，全八卷(東京：岩波書店，1992-93)。
- ⑦ 溝口雄三、濱下武志、平石直昭、宮島博史編輯：《アジアから考える》，全七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94)。
- ⑧ 堀田善衛：《インドで考えたこと》(東京：岩波書店，1957)；《上海にて》(東京：筑摩書房，1959)；武田泰淳：《黄河海に入りて流る》(東京：勁草書房，1970)；竹内好：《現代中國論》(東京：河出書房，1966)；《日本とアジア》(東京：筑摩書房，1966)等。
- ⑨ エドガー・スノー(Edgar Snow)：《中國の赤い星》(東京：筑摩書房，1952年宇佐美誠次郎譯，1975年松岡洋子改譯)；アグネス・スメドレー(Agnes Smedley)著，阿部知二譯：《偉大なる道：朱徳の生涯とその時代》(東京：岩波書店，1955)等。
- ⑩ 高橋和巳：《新しき長城》(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67)等。
- ⑪ A. L. ストロング(Anna Louise Strong)著，西園寺公一譯：《人民公社は擴がり深まる》(東京：岩波書店，1960)；W. ヒントン(William Hinton)著，加藤祐三等譯：《翻身：ある中國農村の革命の記録》(東京：平凡社，1972)等。
- ⑫ 船橋洋一：《内部：ある中國報告》(東京：朝日新聞社，1983)；フォックス・バターフィールド(Fox Butterfield)著，佐藤亮一譯：《中國人》(東京：時事通信社，1983)。
- ⑬ 「叢書 現代アジアの肖像」，全十五冊(東京：岩波書店，1996-97)。全十五冊目録如下：横山宏章：《孫文と袁世凱》、野村浩一：《蔣介石と毛澤東》、西村成雄：《張學良》、天兒慧：《鄧小平》、若林正文：《蔣經國と李登輝》、徐大肅：《金日成と金正日》、李鍾元：《李承晩と朴正熙》(未完)、長崎暢子：《ガンディ》、村島英治：《ヒブーン》、古田元夫：《ホー・チ・ミン》、白石隆：《スカルノとスハルト》、藤原歸

- 一：《マルコス》(未完)、根本敬：《アウン・サン》、萩原宜之：《ラーマンとマハティール》、岩崎育夫：《リー・クアンユー》。
- ⑭ 渡邊利夫：《アジア新潮流》(東京：中央公論社，1990)；エズラ・F. ヴォーゲル(Ezra Vogel)著，渡邊利夫譯：《アジア四小龍——いかにして今日を築いたか》(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等。
- ⑮ 孫歌：《アジアを語ることのジレンマ——知の共同空間を求めて》(東京：岩波書店，2002)；子安宣邦：《「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近代日本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東京：藤原書店，2003)等。
- ⑯ 青木保、姜尚中、小杉泰、坂元ひろ子、莫邦富、山室信一、吉見俊哉、四方田犬彦編輯：「アジア新世紀」，全八卷(東京：岩波書店，2002-2003)。
- ⑰ リチャード・バーンスタイン(Richard Bernstein)、ロス・H. マンロー(Ross H. Munro)著，小野善邦譯：《やがて中國との闘いがはじまる》(東京：草思社，1997)；ゴードン・チャン(Gordon Chang)著，栗原百代等譯：《やがて中國の崩壊がはじまる》(東京：草思社，2001)等。
- ⑱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02)。
- ⑲ 日本版：「本とコンピュータ」編集室：《東アジアに新しい「本の道」をつくる——東アジア共同出版》(東京：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ICC本部，2004)；台灣版：《東亞四地：書的新文化》(台北：網絡與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馬場公彦 1958年出生。1981年北海道大學文學系畢業。1983年獲同校文學系大學院東方哲學研究科文學碩士。先在東方書店工作，1989年加入岩波書店，先後任《思想》、《世界》編輯，現任學術一般書編輯部主編。著有專著《圍繞〈緬甸的豎琴〉的戰後史》和論文多篇。